

● 老舍研究丛书 ●

张桂兴
编著

《老舍全集》 补正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 老舍研究丛书 ●

《老舍全集》补正

张桂兴 编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舍全集》补正 / 张桂兴编著.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01.12

ISBN 7 - 5078 - 2101 - 3

I. 老… II. 张… III. ① 老舍 (1899~1966) - 文学研究
② 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75263 号

《老舍全集》补正

编著者	张桂兴
责任编辑	李 镇
封面设计	张 荔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68036519 68033508 [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山东莒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526千字
印 张	21
印 数	2000册
版 次	200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5078 - 2101 - 3 / G · 894
定 价	45.00元

国际广播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空前的学术价值 难以弥补的遗憾

——《老舍全集》十九卷本读后（代序）

1999年2月3日，是老舍的百年诞辰。在此期间，海内外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来缅怀这位为中国20世纪文学以及世界文学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人民艺术家。与其他纪念活动相比，《老舍全集》十九卷本（以下简称《全集》）的出版^①，对老舍研究的深入发展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作为一名老舍研究者，笔者有幸较早地阅读了这部皇皇巨著。一方面，为它空前的学术价值而叫好，深深感到，《全集》是20世纪老舍作品收集、发掘、整理和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老舍近半个世纪创作的总汇。它的问世，不仅对21世纪的老舍研究将会产生难以估量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其他作家的深入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另一方面，笔者也为《全集》所出现的严重资料错误而深感不安，觉得它对老舍研究无疑将会产生负面效应，影响老舍研究更深入更健康地进行。

下面，笔者就坦诚地分析一下《全集》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供广大老舍研究者和爱好者阅读时参考。

^①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一)

谈到《全集》编选的成就,最值得肯定的就是《全集》编选思想的开放性,以及《全集》内容的丰富性。众所周知,过去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文学大师的全集时,除了《鲁迅全集》保持了作品的原貌外,其他大师的全集都做不同程度的取舍或删改,特别是回避了那些与历次政治运动有关的“敏感”篇章或段落。《老舍全集》的编辑者在做过反复的调查研究之后,充分借鉴了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的经验教训,从而确定了《老舍全集》独特而先进的编选思想。正如编辑者所说:“这次编辑《全集》,我们的一条总的原则就是要保持老舍创作原貌,现存老舍作品全部收入,没有撤去任何一篇。收入的作品除改正个别原版误植之处,不加任何删节改动。”^① 尽管编辑者所制订的编选原则最后未能全部实现(下面将要单独分析),但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对《全集》的编选来说自然是十分重要的。

伴随着这种开放的编选思想而来的,是《全集》内容的丰富性。与先前所出版的《老舍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相比^②,《全集》新增加了200多万字,这比《文集》当然要丰富得多了。其中,小说增加了《她的失败》、《天书代存》、《小人物自述》等3篇;戏剧、戏曲和电影文学剧本增加了《国家至上》、《王老虎》、《桃李春风》、《五虎断魂枪》、《第二个青春》、《人同此心》等20部;曲艺增加了《张忠定计》、《游击战》、《文盲自叹》、《铃铛谱》、《打小日本》、《女儿经》等45篇;诗歌增加了《救国难歌》、《希望》、《居庸关》、《赠吴组缃》、《和杜宣》等约200首;散文、杂文增加了《更大一些的想象》、《广智

① 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载1999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② 《老舍文集》,16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11月至1991年5月北京第1版。

院》、《到武汉后》、《慰劳》、《我说》等约 300 篇；文论增加了《论文学的形式》、《小说里的景物》、《文艺思潮讲义》、《论通俗文艺》、《精彩的小戏》等约 180 篇。另外，工作报告、书信、日记、译文、教材、早期佚文、英文作品等，则是首次收入《全集》。^①由此可见，《全集》是迄今为止收集得“最全”的一部老舍作品集。这样一部《全集》的出版，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实践证明，任何科学领域的学术研究，不管涉及到的范围有多么广，采用的方法有多么新，选取的是宏观角度还是微观角度，都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首先要详尽地占有资料。恩格斯曾经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材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②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全集》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老舍著译资料，从而为深入进行老舍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资料基础，这也正是《全集》问世的根本价值所在。

《全集》中新增加的篇目，有相当一部分自发表后鲜为人知，也有一部分从未公开发表过，这次在《全集》中首次与读者见面，从而大大拓宽了老舍研究的空间，也为广大老舍研究者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首次收入《全集》的《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以下简称《纪略》）等早期非文学类佚文，可以帮助我们探讨老舍早期的基督教信仰和教育思想。《纪略》详细地介绍了

① 参见舒济、王海波：《〈老舍全集〉的出版及其学术价值》，载《老舍与二十世纪》第 437～438 页，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 1 版。本文又载《盐城师范学院学报》1999 年第 3 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9 年第 9 期转载。

② 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118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 5 月第 1 版。

北京缸瓦市伦敦教会改建为中华基督教会的经过,系统而完整地规定了教会的宗旨和组织原则。这是老舍力图使基督教中国化的改革大纲,老舍关于华人自办基督教会的设想,在本文中做了系统、完整、具体的阐述。如果将它与另一篇首次收入《全集》的老舍早期宗教译文《基督教的大同主义》相联系,能启发我们更深入地去探讨老舍早期的宗教救国思想。还有一篇首次收入《全集》的老舍早期宗教教育论文《儿童主日学与儿童礼拜设施的商榷》,则集中地阐述了老舍力图改革宗教教育形式——“主日学”的主张。老舍针对当时中国教育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决心对“主日学”的教学内容和教育方法进行大胆改革,这种努力自然是很可贵的。假如再进一步,将本文与老舍在英国期间所编写的《灵格风汉语教材》,以及在山东期间所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等教材相比较,还能帮助我们深入探讨老舍不同时期的教育思想。

长期以来,老舍的翻译作品很少为人所知。就连老舍的好友楼适夷先生也认为,解放后老舍所翻译的萧伯纳的《苹果车》,“可能是他出版过的惟一译作了”^①。即使老舍本人,也矢口否认自己曾经做过翻译工作。他在1954年8月举行的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我没有做过翻译工作,因为我知道这种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不敢冒昧尝试。”^②实际上,老舍一生中的译作还是不少的,目前已经发现的有16篇(部),约计二十五六万字。这些译作首次选入《全集》,从而向老舍研究者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探讨的问题,比如:老舍从事翻译的动因是什么,老舍的译作有何倾向性,老舍的翻译方法有什么独特之处,老舍对西方文论有何偏爱,老舍翻译的《文艺批评》这部理论著作对他一生的创作有什么影

① 楼适夷:《忆老舍》,载《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辑第132页。

② 老舍:《关于文学翻译工作的几点意见》,载《我热爱新北京》第100页,北京出版社1979年4月第1版。

响,老舍翻译的一些教材和教参对他的教学有何帮助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十分新颖而又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课题,亟待我们去做深入研究。

《全集》的问世,为探索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比较确凿的资料和比较权威的文本,从而使寻找“真实的老舍先生”成为可能。比如将众多的老舍书信首次收入到《全集》之中,对于我们探讨老舍不同时期和阶段的人生历程和创作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可以说,每一封书信不仅透露出了老舍在写信时那个特定时刻的真实思想,而且也代表了老舍在当时那个特定时期和特定阶段的思想状况。甚至可以说,从老舍书信中可以粗略地窥视到老舍一生中几个重要人生阶段的足迹。比如,从《致子祥兄》这封信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老舍在青年时期曾经追求过“婚姻自由”,也曾发生过“初恋”的悲剧,并一度恪守过“独身主义”。这对于我们了解老舍青年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肯定是有重要帮助的。《致西南的文艺青年书》中,老舍则正确地总结了自己创作的成功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那就是“太好进取,而忘了慎重”。现在看来,这段自白,是老舍对自己创作情况所作的深层次的理性反省,对正确评论老舍的作品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直至今日,我们还可以借用这句话来评价老舍一生创作中的得与失,并且依然是恰如其分的。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这封书信的重要价值来。《致何容》这封信,则真实地讲述了老舍当年寄居美国纽约时去留不定的矛盾心情,对于研究老舍在美国时期的思想发展和生活状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全集》中首次披露的老舍日记,详细而具体地记载了老舍在解放后几个人生阶段的活动足迹。其中,既有部分参与重大国事活动和外事往来的内容,也有一些日常生活、写作情况、工作日程的记载。它既是老舍当时生活和工作情况的真实记录,也是反映老舍当时思想状况和创作经过的第一手材料,对探索老舍的思想

发展和创作道路是十分难得的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宝贵资料,日记的字里行间无不充满着国际和国内激烈斗争的风云。例如,老舍参加“广州会议”的日记,从一个角度向我们展示了会议的大体过程,记录了我党为纠正极“左”的文艺路线、贯彻落实“双百”方针所作的艰难努力。而老舍的“访日日记”,则填补了老舍在本时期行踪记载的空白,再现了这位文化使者活跃在异国他乡、从事外事活动的身影。所有这些,都是极为宝贵的资料,为我们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来分析探讨老舍的思想发展和创作道路提供了活生生的佐证。

(二)

在充分肯定《全集》编选的巨大成绩、认同它具有空前的学术价值的同时,笔者也不得不坦率地指出,《全集》也给读者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全集》对自己所确定的开放性的编选思想未能全部贯彻,对读者所做出的“没有撤去任何一篇”的承诺也未能完全兑现,结果导致了《全集》仍然不“全”。尽管“全”是相对的,绝对的“全”是不可能的,但是,那些早已为读者所熟悉的篇目,甚至于多次被收入过老舍其他专集的篇目,《全集》无论如何也是不应该漏掉的。例如,《国庆与重阳的追忆(济南通信)》,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海南版),不知何故被《全集》遗漏了;《小动物们续(鸽)》,曾收入《文集》第14卷,《全集》却只收了“正篇”而遗漏了“续篇”;两篇同名散文《敬悼许地山先生》,曾分别收在《文集》第14、15卷,《全集》却只收了第14卷中的一篇而遗漏了第15卷中的一篇。《多写些小戏》、《世界人民要求释放季洛姆》、《你看见过肯尼迪吗》等篇目,老舍生前就已经发表过,《全集》不收也是不合适的。至于《〈龙须沟〉人物介绍》、《顶可爱的北京》等篇目,则是近几年才被发现并见之于报刊的,按理说也应该收入到《全集》中去。遗憾的是,以上这

些篇目,在《全集》中均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全集》在编选老舍的短篇作品时,有的将老舍生前所编定的专集和单行本直接收入了《全集》,如《老牛破车》、《出口成章》、《和工人同志们谈写作》等;但也有的则是按照原刊收入的,如曾收入《老舍幽默诗文集》、《福星集》、《小花朵集》中的部分文章。然而仔细分析一下,这种取舍似乎缺少令人信服的依据。例如,《全集》为了照顾老舍幽默文体,而将长篇散文《一些印象》分为散文和幽默文两部分,分别收入了《全集》第14卷和15卷。当年,老舍是为了编选《老舍幽默诗文集》一书的需要,才去节选《一些印象》的。现在,我们是在编选《全集》,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再将一篇文章人为地分成两半了。特别是《老牛破车》,由于《全集》不是按照初版本,而是根据老舍1944年前后的增补本(未能出版)而收入的^①。这样,就给《全集》带来了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如: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的《我怎样写〈火葬〉》一文,与随同长篇小说《火葬》收入《全集》第3卷的《〈火葬〉序》,实际上是同一篇文章。一般来说,一篇文章在同一部《全集》中不宜出现两次。随同《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全集》第16卷的《我怎样写通俗文艺》和《我怎样写〈剑北篇〉》两文,也无法找到它最初的发表时间和出处。《全集》“附录”中说《我怎样写通俗文艺》载1941年1月1日《抗战文艺》第7卷第1期^②,但笔者在该刊中未能查到该文。从内容上来看,前一篇文章系根据《〈三四一〉序》和《三年写作自述》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后一篇文章系根据《〈剑北篇〉序》和《〈剑北篇〉附录(致友人函)》两文编辑整理而成。如果单独出版《老牛破车》增补本,收入以上两文那是很合适的。但如果要将两文随同《老牛破车》增

① 参见《本卷说明》,载《老舍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② 舒济、郝长海、吴怀斌编撰:《老舍年谱》,载《老舍全集》第19卷第5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补本收入《全集》，最好能查明它的原始出处。另外，《全集》第13卷收入的旧体诗《改编〈荷珠配〉脱稿有感》，也系误收。它并非是老舍本人的诗作，而是老舍手书唐代诗人韦应物的一首诗。尽管该诗的认定过程中笔者应负主要责任，但收入《全集》后所产生的影响就不是笔者所能承担的了。

《全集》所留下的遗憾之处不仅存在于选篇上，而且更多的是表现在内容上。对已经收入《全集》的部分文章，不仅未能兑现“不加任何删节改动”的承诺，相反的却出现了大面积的“删节改动”。这些改动，有的就发生在《全集》的编选中。如《全集》中收入的散文《且在生活上表现点爱国样子吧，哪怕是假的也可以！》，后半部分误排了梦惜《悲惨的纪念——“九一八”七周年的献词》（刊载于老舍文章的下部）的部分内容，造成了张冠李戴。《全集》中收入的散文《自谴》，使原文的大部分内容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显得很不完整。《全集》中收入的新诗《打》，后半部分误排了老舍的另一首新诗《战》的诗句，造成了该诗的不伦不类。《抗战民歌二首》，也由于《全集》未从原刊收入该诗，以至于漏掉了第二首。旧体诗《内蒙东部记游》，也不知是何原因，《全集》将后面的（二）、（三）、（四）首全删掉了。相声《过新年》，在收入《全集》时把原刊稿中的两页给漏掉了，结果使这段相声变得残破不全……以上种种情况的出现，虽然未必是编辑者主观上的意愿，然而在客观上却已经造成了《全集》的差错。

另一种情况是，由于《全集》的编选未从原始文献入手，而是在借鉴以往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于是使那些过去曾经“删节改动”过的篇目堂而皇之地走进了《全集》。如散文《内蒙风光》，在收入《老舍散文选》时最早被“节选”，现在“节选稿”又被顺理成章地收进了《全集》。然而，这种以“节选”身分收入《全集》的篇目，总让人产生出一种名不正而言不顺的感觉。散文《白石夫子千古》，由于原刊稿中有两段关于“反右派斗争”的内容，于是在初收

《老舍散文选》时做了删改，如今“删改稿”也被收进了《全集》。新诗《新春之歌》，在初收《老舍新诗选》时删去了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诗句，如今“删改稿”也被《全集》所收入。其他，如相声《神仙辞职》，快板《我们选举了毛主席》，散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论文《请多注意通俗文艺》，讲话《我的几点体会》、《说好新书》，创作谈《答友问》、《积极发挥文艺尖兵的战斗作用》等篇目，也都对个别“敏感”段落做了删改。这些删改，从文献学的角度来讲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保证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对编选者最起码的要求。正如一些学者以及本书的编辑者所说的：“后人无权删改作家既成的东西，历史是不能改变的。”“老舍作为社会的一分子，他的思想不能超越时代，必然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解放以后许多作家都有着和老舍相似的经历，他们的作品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存在。只有承认历史，才是尊重历史，尊重作者。”①

当然，《全集》中更多的差错是由于对原刊稿的误排而造成的。如《“七七”抗战五周年纪念》，仅是一篇二三百字的题词，居然错排了3处。《希望》这首34句的短诗，竟错排了七八处。《祝贺儿童节》这首短诗也只有18句，结果错排了一句，漏掉了一句。《家庭会议》这段五六千字的相声，就有20多处与原刊不同。《文学创作和语言——在作协湖南分会举办的文学讲座会上的报告》，竟然出现了40多处差错。《读与写——卅二年三月四日在文化会堂讲演》、《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等，创《全集》差错之最，达70处之多。其他，像《三个月来的济南》、《怎样维持作家们的生活》、《灵的文学与佛教》、《抗战与文艺——两年来全国文艺活动的报告》、《文艺界情况述略》、《谈诗——在文华图书馆专校演词》、《如何接

① 舒济、王海波：《尊重历史，尊重大师——写在〈老舍全集〉出版之际》，载1999年2月4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受文学遗产》、《关于文艺诸问题》、《习作新曲艺的一些小经验》、《〈龙须沟〉的人物》等，每篇的差错都高达20多处。此外，像《游击战》、《打小日本》、《新气象新气度新生活》、《一年来之文艺》、《这一年的笔》、《关于“文协”》、《血点》、《敬悼许地山先生》、《我所认识的沫若先生》、《一年之计在于春》、《谈献金》、《略谈抗战文艺》、《一点写剧本的经验》、《怎样写文章》、《树立新风气》、《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我怎么写的〈春华秋实〉剧本》、《锦绣江山》等篇目，差错也都高达十几处。

值得注意的是，《全集》中有的篇目已不仅仅是个别漏字错字的问题，而是成句成段的遗漏。如《写信》，仅一千多字，就被遗漏了两句（段），并将原刊时的“十六条”改成了“十四条”。《论文学的形式》，漏掉了两句（段）。《答客问》，漏掉了四句（段）。其他，像散文《趵突泉的欣赏》、《济南的药集》、《耍猴》、《新年的梦想》、《暑假》、《吃莲花的》、《何容何许人也》、《在乡下》、《习作二十年》、《归自西北》、《向妇女同志们致敬》、《赠于非闇画师》、《立春大吉》、《过新年》、《在火车上》，山东快书《吓一跳》，新诗《怒》、《听王少堂老人评讲〈武松打虎〉有感》，论文《在新歌剧改进诸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艺术家也要杀上前线去》、《怎样读小说》、《创作经验谈》、《谈“粗暴”和“保守”》、《听曲感言》、《我的几句话》、《勤学苦练，提高作品质量——在大同市一个文艺报告会上的讲话》等篇目，也都遗漏了一句（段）或几句（段）。

更为严重的是，《全集》中的删改和遗漏不仅仅造成了文字上的出入，而且也改变了原文的本意，有的甚至与原意完全相反。例如，《〈偷生〉之前》，有两处虽为一字之误，却使该句的意思或人物关系完全改变了。第一处，原刊时为“女主人大赤包作了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全集》中却变成了“舞女检查所的所长”。第二处，原刊时为“与舅爷陈野求绝交”，《全集》中却变成了“与姑爷陈野求绝交”。再如，《济南的药集》中，将“这末一样的药名和拉丁名”误为

“这每一样的药名和拉丁名”；《抬头见喜》中，将“母亲也没接神”误为“母亲也没精神”；《小病》中，将“且不至明过了度”误为“且至明过了度”；《神的游戏》中，将“言语没有我的俏”误为“言语没有我的情”；《诗与散文》中，将“文字与思想恰恰不多不少相等”误为“文字与思想恰恰不是多少相等”；《歇夏（可以叫作“放青”）》中，将“去年春天”误为“去年夏天”；《立秋后》中，将“到处受友人的招待”误为“到处受女人的招待”；《暑避》中，将“暑气天然不来”误为“暑气天然下来”；《在新都文化界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大会上的演讲》中，将“被埋在书堆里”误为“被埋在骨堆里”；《她记得》中，“又愿说出小心里的委屈”误为“不愿说出小心里的委屈”；《答客问》中，将“取精弃粕”误为“去精弃粕”；《致陶亢德》中，将“三百行”误为“三万行”；《血点》中，将“滥加修饰”误为“稍加修饰”；《去年今日》中，将“在英国”误为“在美国”，“又准知道”误为“且谁知道”，“迟迟不去的”误为“迟迟而去的”；《海外书简》中，将“好莱坞光有人才”误为“好莱坞是有人才”……在这里，原文的意思被表达“反了”或“错了”。至于在《我的理想家庭》中，将“讲恋爱”误为“讲恋家”；《抗战中的通俗文艺》中，将“要些字眼”误为“要些字眼”；《剧本习作的一些经验——在全国文工团工作会议上的发言》中，将“愤怒的火焰”误为“愤怒的语言”；《活“武松”》中，将“花斑大虫”误为“花斑小虫”；《改编“绕口令”》中，将“逗喂”误为“逗眼”；《铃铛谱》中，将“问鹅”误为“问鸡”；《挑起新担子》中，将“混混”误为“混蛋”，“撮作”误为“写作”；《安国访问迷惑》中，将“空想”误为“理想”；《眼福》中，将“运璧”误为“运气”等等，就更叫人无法理解了。还有些地名、人名，《全集》中的错误更为明显，如“雅斗”误为“雅门”，“东北大学”误为“东北大家”，“叶楚仑”误为“叶楚含”，“佩弦”误为“佩统”，“卢冀野”误为“卢翼野”，“支超明”误为“史超明”，“芦江”误为“卢江”，“区铁”误为“区铁”，“栾淑英”误为“樊淑英”，“张成云”误为“张庆云”，“吴海发”误为“吴海法”，“徐德明”误为“陈德明”……

在其他资料的使用上,《全集》中也存在着一些差错。比如《全集》所注明的老舍作品的原刊出处,就有一部分欠准确。像《诗与散文》,原载1934年11月19日、11月26日、12月3日《国立山东大学周刊》,《全集》却误为“《国立山东大学周报》”;《诗人》,原载1941年5月30日重庆《大公报》,《全集》却误为“《新蜀报》”;《邵恒秋先生画展》,原载1945年11月10日重庆《大公晚报》,《全集》却误为“《大众晚报》”;《元旦试笔》,原载1958年1月1日《北京日报》,《全集》却误为“《人民日报》”;《赠广州部队战士话剧团》,原载1965年9月20日《解放军报》,《全集》却误为“《解放军日报》”……资料是客观的,它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存在学术观点的争鸣。造成《全集》中这些资料性错误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校对粗心造成的,但更多的则是由于《全集》未能及时吸收最新成果所致。新时期以来,经过众多老舍研究者的辛勤核对,老舍著译出处基本上已经核实清楚了。但《全集》中却依然沿用过去不太准确的资料,因而出现一些资料性错误是必然的。为了对老舍资料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责,也使老舍研究者少走弯路,有必要将《全集》中出现的老舍资料错误彻底改正。

对于《全集》中所收入的英文作品和英文原件,笔者无力去一一做核对工作。但有些夹在汉语中的英文,也顺便查出了一些失误。如在《大地的女儿》中,将“Yaddo”误为“Xaddo”;在《客》中,将“Algernon”误为“Albernon”;在《小说里的景物》中,将“Arnold”误为“Annold”;在《文学与作家》中,将“Nitchie”误为“Nitchic”;在《文艺中理智的价值》中,将“Elizabeth”误为“Elizabath”……

以上所述,也只是列举了《全集》中存在的一小部分差错,实际上,《全集》中的差错比列举出来的要多得多。作为一位文学大师的《全集》,出现这么多的差错,是非常不应该的。这既与老舍文学大师的地位不相称,也有损于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家著名出版社的声誉。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的遗憾!

(三)

《全集》之所以出现如此众多的遗憾,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据编辑者说:“《全集》正式启动是在1997年秋,到1999年1月完成,经历一年多时间。”^①为了让《全集》赶在老舍百年诞辰之前问世,“抢时间”就成了头等大事,编选质量相对来讲也就退到了次要地位。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于“抢时间”而导致最后出现问题的,《全集》的编选和出版当然也不会例外。

就编辑人员的投入来说,尽管《全集》的“编后记”中罗列了很多编辑者的姓名^②,但据笔者所知,出版社的其他编辑都另有编稿任务,很难将全部精力投入《全集》。按照专业分工,有的编辑同志也只是负责《全集》中某一部分或某一方面的编稿或翻译任务。真正从头至尾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全集》编辑中去的,实际上也只要一两位编辑。这一两位编辑同志,再加上舒济先生,就组成了《全集》的核心编辑班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如果要求他们两三个人从原始文献入手,编选和出版一套八百万字、十九卷本的《全集》,那是何等艰巨而又紧张的任务啊!

特别是在这个编辑班子中,缺少了另外一个方面的生力军,那就是其他专家、学者的参与。这一点,也是《全集》与其他大师级全集编选方式的不同之处。作家亲属提供文稿,出版社负责编辑,这种合作出书的方式目前在出版界较为流行。其优点是简单、方便,防止了一些不必要的干扰,从而使出版周期大大缩短。但也正是由于缺少了来自专家、学者的意见,编选视野难免会受到一定的局

① 舒济、王海波:《〈老舍全集〉的出版及其学术价值》,载《老舍与二十世纪》第437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

② 《〈老舍全集〉编后记》,载《老舍全集》第19卷第6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月北京第1版。

限。因而,笔者认为,对于文学大师的全集编选,一般不宜采用这种方式。因为据笔者所知,作家亲属往往都具有较浓重的感情色彩,他们考虑更多的常常是如何维护作家的权益,以及怎样尽力保持作家的“美好形象”等问题。而从事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则更注重于理性分析,他要强调的是如何立足于原始文献本身,事实求是地去反映作家创作的真谛。因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两者之间既存在着许多共同点,也存在着认识上的明显差异,相互合作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尽管《全集》编辑班子中的成员也都是老舍研究中某一方面的专家,他们多年来一直从事老舍作品的编辑出版和老舍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有目共睹,成绩斐然,但是,他们在《全集》的编辑中毕竟有自己特定的立足点和角度,因而也就不可能代替其他专家、学者所能起到的作用,这样,《全集》也就缺少了来自另一个角度的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把关。

鉴于编辑时间紧、人员投入少的客观情况,也随之带来了造成《全集》缺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运作方式的失误。据编辑者说:《全集》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来出版的《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的^①。那么,如果《全集》采用这种运作方式,那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其一,《文集》必须是忠实于原刊的;其二,如果《文集》达不到忠实于原刊的程度,那就必须以原刊为准对《文集》进行“重新整理”。可惜的是,这两个重要的前提条件《全集》都不具备,所以最终出现诸多遗憾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众所周知,《文集》16卷本陆续出版于1980年11月至1991年5月,前后历时十余年。而在这十余年间,中国的发展变化固然是巨大的,然而改革开放的步伐却是逐步的,人们的认识也是在不断深化,并非是一步到位的。这一点,在《文集》的编辑出版中也明

^① 舒济、王海波:《〈老舍全集〉的出版及其学术价值》,载《老舍与二十世纪》第436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